

反迫害19年 法轮功学员愿世人了解真相

2018年6月20日，近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国会前的草坪上集体炼功，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一起来呼吁结束这场发生在中国对亿万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惨烈迫害。

上午9点，身穿黄衣白裤的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国会西边草坪上集体炼功。悠扬的音乐，舒缓的动作，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纽约法轮功学员高红梅每年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4次，而就在5月下旬，她72岁的母亲——法轮功学员胡玉兰，因在中国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在吉林市船营区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到非法抓捕、抄家、批捕和关押。

高红梅说，她母亲修炼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在家里，经常遭到脾气不好的父亲的打骂，从不抱怨，但沉默寡言；在单位里，也经常受到同事的欺负，但从不记恨同事。

1995年修炼法轮功后，不管父亲再怎么刁难发脾气，母亲总是笑呵呵地善待父亲，工作上也不与人争斗；而更大的变化是身体的改变，多年的鼻炎也消失了，“母亲跟同龄人身体比起来强多了，甚至走路比我都快”。

高红梅说，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母亲前往北京上访，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2001年新年时，她母亲因为在住家小区发资料，被非法抓捕送到吉林看守所劳教一个月，之后被判刑一年关在吉林长春黑嘴子监狱，在里面做劳工。

高红梅呼吁善良的人们赶快明白真相，一起来制止中共对善良民众的迫害，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立即释放她母亲胡玉兰。

去年底来到美国纽约的湖北法轮功学员李俊，是第一次参加法轮功反迫害大游行。她说，在国内，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中共残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会西草坪上举行集体大炼功。

酷的迫害。据不完全统计，李俊所在的湖北仙桃市，在这场持续19年的毫无理性的迫害中，至少有8人被迫害致死，80余人次被劫持至看守所迫害，先后被劫持至沙洋劳教所或武汉马湖女子劳教所迫害20余人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的约70人次，被非法判刑的有17人次，约有23人次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或者邪恶之徒私设的拘役场所（一般都是选一个偏僻的地方，进行刑讯逼供），被骚扰、抄家、勒索难以统计。

李俊说，有一对同修夫妇叫刘雄和童冬香，他们曾经在一起发真相资料，2016年，刘雄因讲真相被绑架到钱江看守所。就在她出国前夕，刘雄被非法判刑两年半。

“刘雄原来在社会上沾染了不少恶习，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原则行

事，由小混混变成人人喜欢的好人，这是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有目共睹的事实。”李俊说，就是这样一个由坏变好的人，遭到中共多次的酷刑迫害。

她透露，“关押他的警察为了迫使他放弃信仰，阻止他讲真相，动用私刑，多名警察轮番围攻，不让睡觉，三九严冬把他衣服扒光并反吊着打，恶警还将他双手用竹签挑开……”

李俊说，她今天参加这个反迫害活动就是要表达一个心声：“停止迫害法轮功，于国于家于民都是最好的选择，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

她也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要求中共停止迫害，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65岁的杨清芳是2013年5月来到美国寻求

政治庇护的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她说修炼法轮功使她身心健康。

“我是1996年得法的，炼功不到一个月我身体的肾炎、神经衰弱、心律不齐、风湿和类风湿等病症全部消失了，走路一身轻。法轮大法不但净化了我的身体还净化了我的心灵。”她感慨说。

1999年7月20日，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数以百万计法轮功学员因为自己“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非法绑架、关押、酷刑，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等；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失业、失学等。

杨清芳在中国曾亲身受到3次迫害。2003年11月，她因传递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非法绑架，连续108天被灌食迫害。

她回忆说：“因为我经常绝食，插管灌食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天（警察）把我绑在床上野蛮灌食四五个小时，五六个人摁着我，用铁器把我的嘴撬开、支住，往嘴里倒稀粥和药，隔15分钟灌一次，开口器一上午都在我嘴里撑着，疼痛难忍。灌食管一插就是一周，换管时插到胃里的管已经变黑了。”

杨清芳说，有时管插不进去，手指头粗的管子插进去又拽出来，有几次插到气管里憋得喘不过气来，“有的同修，就是因为管子插到气管里而致死”。“邪恶还让吸毒犯拳打脚踢、扯头发，用低级下流话辱骂我和我师父。恶警用胶皮棍打我臀部成黑紫色，不能坐，还用站墙根、太阳晒、冰冻、跑步等方式折磨我们。”

杨清芳说，中共的打压迫害使她不得不逃离中国。“我出来的目的就是告诉全世界，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冤枉的，是千古奇冤，我要揭露中共这场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易如）

兄弟俩的命运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

第一次知道董时进这个名字，是从谢泳先生的《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一文中，谢先生称他是一个始终不能让自己忘怀的知识分子，而通过谢先生的粗略介绍，笔者也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查阅了他更多的生平资料。

1900年10月出生的董时进，先是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弃工学农，入京师大农学院学习。1920年考入清华大学，并获公费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1924年获该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其后旅欧考察农业和土地制度，1925年回国。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学校教授农业经济，并担任过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农学院、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及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等职。

不过，董时进并非是一位死读书的农学家，他曾创立“中国农业协会”、“现代农民社”等组织，创办全国公开发行的《现代农民》月刊，在成都建农场，还在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党主席，该党成员多为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

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他建议政府用赎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

但让笔者最为惊讶的是他对共产党的认知，以及逆流而上，上书毛泽东，公开反对其土地改革。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

1947年，国民党取缔了倾向于中共的民盟。作为民盟成员，董时进在独立杂志《观察》上发表了题为《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的文章。文章认为取缔之举是政府的下策，是害大于利。他写道：“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

因此，他劝国民党道：“政府

假使是聪明的，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党的短处，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

在那个时代，能够清醒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这点区分的知识分子并不多。除了董时进，彼时还有《观察》的主办者储安平和大知识分子胡适、钱穆、傅斯年等寥寥几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是在惨痛加身后才体味出来。

储安平曾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如此写到：“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非‘民主’”。

而曾对国民政府给予最为严厉的批判的胡适也指出，“共产党当政必是铁幕社会”，“暴力党追求的是绝对的专制，绝无自由之可能”，“国民党是自由多少的问题，共产党关系到自由有无的问题”。

胡适曾告诫世人：国民党政府初步实施了宪政，认同自由价值观，不反对多党制，沿着这条道路，必能和平走向完全自由的民主社会；而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坚决最强烈的独裁党，追求的是绝对的一党专制，夺权后必将万马齐喑。

董时进、储安平、胡适等人的预见早已在中国大陆应验。可叹的是，这三人中，将共产党看得如此透彻的储安平后来却变的十分天真，并选择留在大陆，追随中共，其最终落得个惨死的下场。而胡适、董时进则选择了转身，逃过了

他们那一代留下的知识分子劫难。

上书毛反对土改 指出中共谎言

土地改革是毛泽东在农村推动的破坏传统结构的一大政策。在中共占领北平，即将建立政权之际，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农民党反对对土改，于1949年6月25日被迫解散。然而，对中共仍抱着一线希望的董时进，在当年年底中共拟在全国进行土改时，大胆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公开反对土改运动。他同时还写信印了几百份，寄给相关的高层要员、各党派的领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学术部门。

关于这封信的原件，因中共封锁档案，目前尚无法看到。但2010年香港《二十一世纪》六月号中的文章《先知者的悲哀》，透出了其信的核心观点。

董时进认为，中共的一些档和讲话中称“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根据国民政府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民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5至10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1000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任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资料，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董的观点是对的。

董时进还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列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董时进亦指出，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出租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财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

显然，作为农学家的董时进对中国的地主、农民、土改的认知是正确的，且道出了中共宣传中的谎言。然而，他或许没有窥见的是中共推行土改背后包藏的祸心，就是通过打倒地主，掀起贫农的仇恨，

来实行中共的专政。而这就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天真了。

由于董时进上书毛时，内心已深知土改大局已定，因此曾悲哀地预言道：中共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如国家税收受影响；不劳而获、用暴力手段夺取他人财产将导致人性沦丧等。当然，“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果如其言，中共推行土改后，又建起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在经历“大跃进”的荒唐岁月后，至少3500万中国人被饿死，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上交粮食的农民。

遭到批判

董时进上书毛后，一直没有下文。此时，土改运动已在全国全面铺开，而学界则展开了对董时进观点的批判，这应该是秉承上面的指示。1950年的《观察》周刊第六卷第十二期的一篇题为《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的文章，就记录了对其观点的批判，批判者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多为董时进的朋友和同事。

文章有这样的表述：“当这个腐烂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拚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通篇的批判显然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而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这当然是中共当局所需要的。

此外，在谢泳的文章中还提到，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谢泳认为，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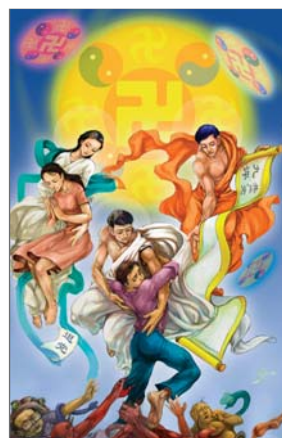
离开大陆 逃过劫难

遭到批判后，董时进深感不妙。他与透过一双慧眼看透了中共的民国女作家张爱玲一样，在1949年后短暂的滞留大陆后，选择了离开。他先是前往香港，之后前往美国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其后曾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1984年4月因肠癌去世，终年84岁。

与同时代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董时进是幸运的，其不仅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而且安度了晚年。

可叹的是，董时进的四弟董时光，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因在朝鲜战争中，发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被美国当局以亲华的罪名驱逐出境，其后回到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职。1957年他被所热爱的中共划为“右派”，1961年前后死于劳改，终年48岁。

董时进、董时光的命运无疑再度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个时代的学人能否看透中共本质并不抱任何幻想，对个体命运至为关键。◎（林辉/因篇幅，有删节）



九評共產黨 引发三退大潮

到2018年6月30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308,319,835